

傳播論壇

數字媒介、控制型社會與新經濟範式

張先廣^a

^a 格蘭谷州立大學傳播學院，艾倫代爾，密歇根州，美國

摘要

以控制型機器為基礎和表現方式的控制型社會有別於以往以熱力學機器為基礎和表現方式的規訓型社會。貌似柔性的控制較之以往嚴苛的規訓更為綿密。資本主義在控制型社會裏發生了一系列變異。以生產為導向的實體經濟讓位於以元生產和營銷為導向的信息經濟，最終翻轉為以捕獲注意力為導向的注意力經濟。平台資本主義處心積慮地奴役大眾，極盡榨取注意力之能事，導致了財富的急劇集中。德勒茲式逃逸線的問題已成為迫切的倫理問題。

關鍵詞：控制型社會、控制型機器、注意力經濟、平台資本主義、臉書

張先廣，格蘭谷州立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研究興趣：媒介理論、德勒茲、弗盧塞爾、塞爾、維利里奧、問性論、廓落學。電郵：zhangp@gvsu.edu
論文投稿日期：2024 年 1 月 10 日。論文接受日期：2025 年 2 月 3 日。

Communication Forum

Digital Media, Control Societies, and the New Economic Paradigm

Peter ZHANG ^a

^a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Allendale, Michigan, USA

Abstract

Control societies are distinct from bygone disciplinary societies in that their foundations and expressions are cybernetic machines, whereas those of the latter are thermodynamic machines. Seemingly soft control is more pervasive and seamless than the harsh disciplines of the past. In control societies, capitalism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mutations. A production-oriented material economy has given way to a meta-production and marketing-oriented information economy, which in turn has flipped into an attention economy oriented toward all but total attention capture. Platform capitalism calculatingly enslaves the masses and does everything within its means to extort, extract, and exploit people's attention, thereby speeding up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Deleuzian lines of flight have become a pressing ethical issue.

Keywords: control societies, cybernetic machines, attention economy, platform capitalism, Facebook

Peter ZHANG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theory, Deleuze, Flusser, Serres, Virilio, interology, khorology. Email: zhangp@gvsu.edu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10 January 2024. Accepted on 3 February 2025.

數字媒介、控制型社會與新經濟範式

如今，遠程監視屏正開始取代窗子。(Virilio, 1999, p. 67)

問題不是去問新舊體制哪個更嚴酷或更堪忍受，因為新舊體制裏都存在著解放與奴役我們的方式之間的衝突。(Deleuze, 1995, p. 178)

問題不是去擔憂或著抱最好的希望，而是找到新的武器。(Deleuze, 1995, p. 178)

注意力是最稀有、最純粹的慷慨。(西蒙娜·韋依)

引言

本文視數字媒介及控制型機器 (cybernetic machines) 為控制型社會的技術基礎，通過引述法國哲學家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關於控制型社會的思考，來揭示資本主義在控制型社會所發生的一系列變異，並以臉書為例來闡明平台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最終聚焦到通過捕獲注意力來加劇財富集中這一新經濟範式的形成。本文意在解蔽 (unconceal) 控制型社會與注意力經濟之邏輯，喚醒大眾看清經濟範式問題背後的社會轉型、認知更新和倫理姿態等問題，從而探尋應對資本主義捕獲裝置的逃逸線 (亦即德勒茲所說的新的武器)。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可以一勞永逸地去解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迭代的策略和博弈問題。大眾所面臨的是一個有組織、謀算、專長、資源和學習能力的巨型機器 (megamachine)。大眾被默許設定為其柔性齒輪或沒有面孔的觸手。真正的逃逸線很可能在於轉心或向內逃逸。這裏既有二階乃至 n 階認知的問題，也有心法的問題。前沿媒介理論、社會理論和中國傳統思想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都需要在新的博弈實踐中去迭代、更新、昇華。本文的貢獻主要在於擺出問題，並借助德勒茲等人頗具前瞻性和穿透力且能啟發我們精確分析當代社會運行模式的思想來更新認知、提供對策。文中對控制型社會的討論完全基於對西方社會的觀察、思考與體悟。為便於說理，行文中將會調用中式思想和語彙，望能引起中文讀者共鳴，以深化讀者對相關問題的理解並提高其警醒程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控制型社會及其技術基礎

在〈關於控制型社會的後記〉（“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一文中，德勒茲談到了三種類型的社會（Deleuze, 1995, p. 178）。其中，傳統的威權社會對應著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傳統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傳統權威的媒介基礎是口語和傳統圖像，前者體現為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聖意難測、天威難犯，後者則體現為偶像崇拜。權力通過公開的懲罰得到展示，以儆效尤。在經濟生活中，傳統權威通過抽成（taking a cut of production）實現自己的利益，但無意於組織生產。表現這種社會形式的機器是簡單的機器，如杠杆、滑輪、時鐘等。以往的規訓型社會對應著韋伯所提出的理性－合法權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理性－合法權威的媒介基礎是文字，對應的法律是成文法。字面主義（literalism）和精英主義（elitism）是這類權威的特點。¹「偶像的黃昏」是一種媒介效應，意味著傳統權威的式微，所說的媒介是文字。規訓型社會的核心特徵是監禁，亦即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在規訓型社會裏，家庭、學校、工廠、醫院、軍營都與監獄十分相似。監獄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個模型，社會就像一座大監獄。在規訓型社會裏，人的境況形同鼯鼠。《摩登時代》（*Modern Times*）和《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是規訓型社會的形象寫照。表現這種社會形式的機器是熱力學機器。規訓型社會面臨的危險包括熵（entropy，即失序）和對機器的毀壞。後者是抗拒權力的一種形式。

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推廣與進一步發展，人類已由以往的規訓型社會步入當今的控制型社會。何謂控制？這要從控制論（cybernetics）一詞說起。該詞源於希臘語動詞「*kybernein*」，其本義是掌舵，或者說通過監視和反饋機制使偏離航線的船隻回到航線。舉例來說，《西遊記》裏唐僧念緊箍咒就是通過反饋機制對孫悟空實施控制。控制型社會對應著韋伯所提出的魅力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和他不曾論及的控制型權威（cybernetic authority）或者說賽博權威。魅力權威的媒介基礎是技術圖像，在政治領域表現為兩雄相爭「酷」者勝：肯尼迪（John Kennedy）「酷」於尼克松（Richard Nixon），看電視的選民很在意這一點，所以肯尼迪勝出；在文化領域表現為世俗化的偶像崇拜，如明星、

網紅影響粉絲，所謂「有士披頭，眾粉逐求」。控制型權威的實質是程序主義 (programmism)，意思是事情如何展開應由程序來控制。²發生偏離時，系統會發出反饋性指令予以糾正。反饋有正有負，無非是根據輸出調節輸入，目的是無過無不及，或者說中庸。在程序被修改之前，忠於現有程序是職能員 (functionary) 的本分。³所以職能員注定是庸庸碌碌的。控制型社會的核心特徵是人們貌似自由，但時刻被監視、跟蹤、操控著。幾乎所有人都戴著形形色色的電子手銬，同時為自己所謂的自由而沾沾自喜。獄卒監視囚犯讓位於社區監督、智能設備監視使用者、自我監視、相互監視、信息系統監視所有人，包括對監視者的監視。奧威爾 (George Orwell) 意義上的「老大哥」已全然非人格化、社會化。人手一機意味著所有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老大哥」的耳目和盯梢對象。一個人即便孤標傲世恐怕也無處隱遁。在不久的將來，《射雕英雄傳》中黃藥師所佩戴的人皮面具一定會走俏一時，隨後很快被淘汰。人臉識別相對於步態識別畢竟是小巫見大巫。後者會使人皮面具形同虛設。步態識別不是甚麼預言。在2018年，臉書的機器已在學習辨別各種活動、興趣、情緒、目光、衣著、步態、頭髮、體型及身姿 (Zuboff, 2019, p. 252)。

華嚴宗的因陀羅網 (Indra's net) 在此值得小書一筆。因陀羅網網目懸珠，珠珠互攝互入，重重映現，有一珠普現一切珠，一切珠影一珠攝之效。也就是說，網絡上每個節點發生的情況，會實時反映到其他所有節點。這恰是全息技術和區塊鏈的邏輯。⁴因陀羅網這一古老的概念預示了互聯網的最終發明，遲早會成為家喻戶曉的隱喻。⁵互聯網的普及意味著蝴蝶效應將常態化。也就是說，一則小小的網絡消息，很可能在不期然間引起軒然大波或全社會的反響。這意味著控制型權威是去中心化、分佈式的權威。其邏輯跟弗盧瑟 (Vilém Flusser) 筆下的室內樂不無相通之處 (Flusser, 2011, pp. 159–167)。自媒體的擴散會將官媒不時置於被動地位。物聯網 (the Internet of Things) 的出現意味著往後許多物件也會通過其數字孿生體而被納入實時監控之下。信息在以指數級增長早已不是甚麼新聞。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信息不再以人為預想的使用者。人在信息的生產過程中往往被降格到裝置 (apparatus) 的伺服機構或柔性齒輪的地位。計算機網絡和移動網絡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為社會的神經系統在深刻地改變著社會的組織形式。《黑客帝國》(*The Matrix*)和《少數派報告》(*Minority Report*)是對控制型社會集體隱憂的顯化和預演。後者在邏輯上酷似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奇境歷險記》(*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讓愛麗絲驚訝的是宣判先於舉證。在《少數派報告》中，行將犯罪者在犯罪之前即被採取法律措施。如今，隨著統計學、概率論、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執法中（至少在警力的分配上）根據預判在案發之前即採取行動的意味正變得日益濃厚。較之以往的社會，在控制型社會裏，人們宛如掉進了寓言意義上的兔子洞中一般。以往的邏輯（如前因後果）被打破，現實顯得很荒誕。Deleuze (1995, p. 180) 暗示，蛇是控制型社會的象徵。

在數字時代，以技術手段對人和物實施監控的例子早已不勝枚舉。手機、電腦、信用卡、考勤卡、酒店的房卡、各種驗證碼、條碼、二維碼、給珍稀動物掛的電子標籤、對郵件及辦公環境物件的追蹤、超市的庫存管理等等都是司空見慣的例子。使用各種應用程序進行自我監控已成為多數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我成了量化的自我(Han, 2017, pp. 60–61)。用手機導航在這裏值得小書一筆。在使用紙質地圖的年代，駕車者對目的地的相對位置會有個歐幾里得式或平面幾何式的整體的概念。用手機導航時則不然。駕車者會有一種007般的行動感，在心理上儼然成為動作片中的主角，又彷彿置身於沉浸式電子遊戲的空間。開錯路不必再著慌，導航軟件會實時糾偏，或重新設計路線，並更新預期抵達時間。這種駕車體驗跟遊牧藝術有相通之處。遊牧藝術家用眼如用手，近距離視覺取代了遠距離視覺，理性的構圖規劃退居次要地位。與之對應的寫作方式是用短期記憶進行寫作。這樣一來，寫作便具有更多的當下性、鮮活性、不確定性、偶然性和故事性。手機導航之便利大大降低了出行前的焦慮。行車路線還可以根據路況實時調整，以節省時間，並減少塞車帶來的不便。另一方面，導航系統在後台也會對駕車者的開車習慣和活動規律進行數據採集。這種數據直接意味著財富和權力。權力總是把人作為知識的對象。智能燃氣表是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為甚麼恰恰在做飯的時候廣告電話會打進來？答案有可能是燃氣公司把數據賣給多名第三方了。在數字時代，活著就意味著產生數據。產生數據就意味著置身於

「老大哥」的監視和掌控之下。如今，人的行蹤，包括在賽博空間的行蹤，和言論，甚至下一刻的活動幾乎無密可保。更有甚者，就連人的注意力也已成爲監控的對象。這一點跟下文要談的新經濟範式關係至密。有朝一日，也許人的夢境和無言的起心動念也會成爲公開的秘密，儘管這一點聽上去似乎有些科幻。總之，「老大哥」要的是全然透明。不透明即意味著對「老大哥」的抗拒。念及洞悉一切的「老大哥」，人們未免會覺得不寒而慄。Tiqqun (2020, p. 75) 在《控制論假說》(*The Cybernetic Hypothesis*) 一書中犀利地指出：「控制型社會是妄想狂的社會，陰謀論的擴散即爲明證。」話又說回來，不能只怪「老大哥」太好刺探，也得怪大眾熱衷於自我暴露。

關於規訓和控制的區別，Deleuze (1995, p. 181) 指出，規訓是不持續的；控制是持續的。在控制型社會裏，人很少能把事情一勞永逸地做完。一事未畢，他事又起。人被迫實時關注環境的變化，隨時調整自己的心態和社會姿態。麥克盧漢 (Marshall McLuhan) 有類似的見解 (1994, p. 138)，在計算機時代，分工明確的「工作」已昔日不再，在多個「角色」之間流暢地切換則成爲常態。麥克盧漢和菲奧里 (Quentin Fiore) 把體育看作社會的濃縮或活範式 (McLuhan & Fiore, 2001, p. 168)。在他們看來，衝浪、滑水、滑雪等新型遊戲體現了一種對地形輪廓進行動態探索的新嗜好，參與者不單以視覺進行體驗，而是全身心地投入 (McLuhan & Fiore, 2001, p. 171)。在德勒茲看來，傳統的以人爲運動起點的體育項目，例如推鉛球，已顯得過時，而衝浪運動則體現著當今的時代精神 (Deleuze, 1995, p. 121)。衝浪是一種「因而不爲」的運動，跟道教和禪宗的心法相契。「因」意味著審勢、順勢、借勢，而非逆勢強爲。而順水推舟、四兩撥千斤是順勢的體現，「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是借勢的形象寫照，逆勢強爲則酷似西方的悲劇精神。在控制型社會裏，一個決策往往取決於其他所有決策，否則就會招致整體性反彈。這恰是「因而不爲」的含義。看來主張因而不爲、隨遇而安的道禪思想在控制型社會裏的復興是理所當然之事。麥克盧漢與鮑爾斯 (Bruce R. Powers) 則把即刻重新適應環境 (亦即隨遇而安，與「因而不爲」指向一致) 看作機器人主義 (McLuhan & Powers, 1989, p. 101)。這也是他們對禪宗乃至整個東亞文化的一種評判。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規訓型社會靠戒律來治理；控制型社會則依賴密碼 (Deleuze, 1995, p. 180)。以疫情期間許多國家採取的防控措施為例，如果說隔離與封鎖屬於規訓，那麼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式的使用則屬於控制。前者顯然是有始有終的，後者則較為持續。這個例子說明，在控制型社會裏，規訓並未銷聲匿跡，但不佔主導地位。目前較為常用的雙重驗證很瑣屑，儘管人們大都習以為常。面對無聊的等待，人人都很無奈。這種日益頻繁的垃圾時間最適合體會職能主義 (functionalism) 的滋味。言下之意，思不出其位、效命於裝置、逆來順受、瑣務纏身、碌碌無為是職能員的宿命。可歎的是，處於職能員境地的恰恰是我們自己。《道德經》第27章有云「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在控制型社會裏，密碼取代了傳統的關楗。人們對雙重驗證的忍耐恰恰說明密碼的關鍵性。時下，手機或電腦因輸錯密碼而被鎖死會讓很多人不知所措。指紋解鎖技術是否合乎倫理很值得懷疑。密碼意味著授權，所授予的權限來自控制系統，並且往往是知情權和遠程行動權。

控制型社會的技術基礎是控制型機器 (弗盧瑟稱之為裝置)、信息技術和計算機。⁶ 這些技術也促使資本主義演變為控制型資本主義 (cybernetic capitalism)。在麥克盧漢和內維特 (Barrington Nevitt) 看來，人不過是計算機沒有面孔的觸手 (McLuhan & Nevitt, 1972, p. 129)。言下之意，控制型社會是個反人本主義的社會。時至今日，一個以計算機為中心的、超出人類尺度的世界已經成形。相應的時間制度是基於納秒的，這對生活在分分秒秒中的人類而言意味著深刻的異化。證券交易所的運行模式是一個範例。人工交易已被程序交易和算法交易所取代。人的地位已由施控之閘 (breaks) 翻轉為受控之流 (flows)。Deleuze (1995, p. 180) 認為控制型社會面臨的危險包括噪音、盜版和病毒的侵染。這些都是針對信息而言的。不過凡事都是辯證的。對抗噪音就要付出冗餘 (意味著低負熵性) 的代價。杜絕盜版意味著扼殺隨盜版而來的創造，如《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多種譯本的出現就闡釋作品而言何嘗不是一種豐富，買斷版權的出版商未必會產生最好的譯本。病毒的存在其實促進了軟件的演化，增大了軟件業的體量，同時也考驗了從業人員的能力。從生態的角度來看，也許控制之心不必過切。

前面提到規訓型社會面臨的危險包括熵（意味著失序）和對機器的毀壞。其實熵與負熵的問題在控制型社會裏同樣重要。負熵意味著小概率情形的出現或新的信息的產生。熵的概念可謂第二、第三代機器之間的紐帶。其本義適用於產生動力的第二代機器，而引申義則適用於產生信息、實施控制的第三代機器。時下寫短信或電子郵件時不招自來、揮之不去的自動提示功能會使語彙、文風乃至思維產生趨同或者說趨熵之勢。趨同意味著創造力的泯滅。紙和筆貌似過時，實為產生語言藝術的絕佳媒介或者說助緣。在筆者看來，控制型社會作為一個相對開放的複雜系統既有保守的一面，其表現為對負熵性事故的防範，又有攝受（prehension）的一，其表現為對負熵性事故的吸納和利用。穩定和生機之間的張力問題是其根本問題。具體的負熵性事故是利還是害，需要有能力的篩濾機制去評判。在隨後的將來，具有學習和自我重新編程能力的智能廓落（Khora）將是這種篩濾機制的化身。⁷在控制型社會裏，相當一部分社會資源被用於監視、誘導，甚至操縱。可以說，監視、誘導和操縱是控制型社會的運行模式和盈利方式。

資本主義在控制型社會裏的變異

Deleuze (1995, pp. 180–181) 指出，在規訓型社會裏，資本主義是集中式、擁有式、以生產為導向的。在控制型社會裏，資本主義是分佈式的，經營者對生產資料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生產讓位於「元生產」（metaproduction）。後者包括對產品的設計與改造、對整個業務流程的策劃與優化、市場調研、戰略管理等等。正如 Deleuze (1995, pp. 181) 所言，以生產為導向的工廠被以營銷為導向的企業所取代；銷售部門是企業的中心或靈魂；營銷成為社會控制的工具。生產轉移到第三世界的工廠。第一世界的企業購買或組裝製成品、刺激消費、提供服務。研發、設計、營銷、採購、物流、客服成為其主要業務內容。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先銷售後調貨、對物流進行實時監控、實現零庫存成為可能。第一世界的採購方對第三世界的廠家在用工制度、環保、可持續性等方面往往能施加影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在控制型社會裏，個體由「不可分體」（individual）降格為「可分體」（dividual），並由此成為企業追蹤和營銷的對象。可分體無異於個體的數字孿生體。企業正是通過這些數字孿生體實現對個體的監控和影響的。如今，人們的注意力是它們關注的焦點和爭奪的對象。以往的「大眾」成為樣本、數據、市場或「庫」（banks）（Deleuze, 1995, p. 180）。廣告是後期資本主義營銷機器的一個重要功能。它刺激人的欲望，讓人分不清「需要」和「想要」的區別。此外，企業還可以利用所掌握的有關客戶及潛在客戶的數據進行定向推送，實施精準廣告和個性化廣告。所謂的「個性化」其實是對侵入、挖掘日常生活私密深處的榨取作業的粉飾。無孔不入的數字媒介在此過程中起著助桀為虐的作用。德勒茲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也強調欲望，但他們所說的欲望是生命對自身之強度的渴求，因而是活力主義的。廣告所刺激與操縱的則是物欲和白日夢。物欲所導致的是物累和真我的迷失，因而是反活力主義的。用一個未必恰當的類比來說，本真的欲望之於偽欲望，猶如內酚酞之於多巴胺。廣告可謂加深了人的異化，最終也加劇了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如何從無隙不乘的廣告的滋擾、纏縛和左右中解脫出來是個嚴峻的實踐問題。

德勒茲暗示，控制型社會即傳播社會（Deleuze, 1995, p. 175）。這說明信息和注意力，尤其是後者，在控制型社會裏佔據著核心位置。控制型社會所對應的經濟是信息經濟和注意力經濟。隨著信息總量的指數級增加，注意力倍顯稀缺，信息經濟從而翻轉為注意力經濟。對傳播持批判態度的德勒茲強調，想要擺脫控制，關鍵在於創造無傳播的空間和斷路器（Deleuze, 1995, p. 175）。「注意間隙」（mind the gap）。有志於抗拒者應聽出倫敦地鐵裏人們熟視無睹的這句標語的弦外之音，並參透其背後的禪理。自心能否作主，盡在一念之間。擺脫控制的目的和標誌是生成和創造。對逃逸線的創造、對擺脫了主流生活腳本的新生活風格的創造是最有意義的創造。禪者以為，內在的逃逸（inscape）強勝外在的逃逸（escape）。創造性是個倫理問題；倫理是個創造性的問題。在控制型社會裏，一般意義上的創造性很容易淪為裝置捕獲的對象。因而對創造性和倫理問題的討論應上升到自創造性（auto-creativity）和元創造性（meta-creativity）的高度。控制型社會的問

題多是「元問題」(meta-problems)，所需的解決方案應該是「元解決方案」(meta-solutions)。

德勒茲所說的控制型社會跟弗盧瑟所說的(充分配備著裝置的)後工業社會異名同實，正如德勒茲所說的控制型機器跟弗盧瑟所說的裝置異名同實一樣。在後工業時代，經濟的重心由生產轉移到設計和營銷、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硬件轉移到軟件、實物轉移到信息和景觀以及廣義的程序、體力勞動轉移到腦力勞動和情感勞動、積累轉移到流動，當中包括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如金融服務業和IT服務業、影音流、美國橄欖球超級聯賽和對梵高作品的沉浸式虛擬現實體驗等。處理信息成為大多數人工作的主要內容。社會對勞作和創意的估值不在一個數量級。閒暇時間增多，無事忙成為常態。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一種新游牧主義悄然興起。作為一種生活態度，新游牧主義注重體驗，如付費聽音樂、分時享用度假房，而不是佔有。微型化和極簡主義是這種生活態度的具體表現。「少就是多」是它的口號。四處遊走翻轉為原地遊走，亦即轉心、坐馳、脫體體驗。跑步機產生了隱喻意義。現實開始讓位於虛擬現實，兩者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日益模糊。傳統的機器讓位於智能化、暗箱式的裝置，亦即控制型機器。作為製造者的人(homo faber)退出舞台的中央，作為遊戲者的人(homo ludens)以及對裝置心懷愛欲的職能員粉墨登場。⁸在思維方面，同屬線性思維的因果和目的思維陰魂不散，程序思維相對於技術環境的現實情況而言略嫌滯後。⁹程序由指令組成，在控制自動裝置的同時，也實施著對人的控制。¹⁰007行動時，往往實時接受著遠程控制。他貌似很「酷」，實則酷似機器人特工。在時裝領域，前一個季節和後一個季節的時裝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每個季節的時裝都是偶然性和程序中所隱含的必然性相結合的結果。只要時間足夠長，可能流行的款式必然會流行，但具體某個款式甚麼時候流行完全取決於偶然因素。整個時裝業存在著很大的隨機性、不確定性和荒誕性(Flusser, 2013, pp. 83–90)。這些也是以裝置為中心的後工業社會的特點。以荒誕風格和荒誕主題著稱的卡夫卡(Franz Kafka)被迫認為後工業時代的預言家是理所當然之事。

應該指出，新游牧主義和控制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游牧和控制都意味著對人身自由受限的超越。在後規訓時代，控制所採取的形式本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身就很遊牧。有形的全景監獄 (panopticon) 消失了，無形的全景監獄主義 (panopticism) 卻瀰漫在整個社會。就效力而言，數字式全景監獄比實體的全景監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控制型社會裏人的所謂自由是悖論式的自由。新版《上海灘》裏的馮程程不喜歡到哪兒都有保鏢跟著。如今的未成年人需要應對的則是實時位置共享。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第10章裏所說的「變得不可感知」(becoming imperceptible) 有著深刻的反控制內涵。道理很簡單，「變得不可感知」意味著從「老大哥」的視野中消失，使控制無從發生。在數字時代，就個體而言，沒有數字孿生體是極大的奢侈。跟知名度相比，隱名度似乎更值得追求。《菜根譚》裏所講的「矜名不若逃名趣」在數字時代越發顯得真實不虛。總之，新遊牧主義並未擺脫也無意擺脫控制。弗盧瑟犀利地指出 (Flusser, 2013, pp. 81–82)「就像格列佛一樣，後工業時代的人類被小人國的網子兜住了。但人類卻渾然不覺，因為網子有彈性……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其實一無所值：他們甚至沒有使自己自由的願望，覺著做奴隸還不錯」。

在經濟生活中，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千高原》第13章中闡述的「捕獲裝置」概念之相干度日益明顯 (Deleuze & Guattari, 1987, pp. 424–473)。捕獲的對象包括人們的微量勞動、閒暇時間、注意力、創造力、購買力、欲望、需求等等，以及在市場上游獵與被獵的各種資本。虛擬現實之父拉尼爾 (Jaron Lanier) 在《誰擁有未來？》(Who Owns the Future?) 一書中談到了數字平台對廣大用戶微量勞動的剝削以及由此導致的經濟的收縮、財富和權力的集中、社會階層流動性 (social mobility) 的降低、中產階級或將消亡等問題，發人深思 (Lanier, 2013)。亞馬遜對實體店市場份額的擠佔、優步對傳統出租車行業的衝擊都是平台資本主義勃興的實例。但平台資本主義波及的範圍遠遠超出純商業性平台，臉書是典型的例子，下文將專門討論。在拉尼爾看來，用戶和服務器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癥結所在。世紀之交，亞馬遜曾因差別定價而陷入爭議。時下，亞馬遜並未放棄這一做法。買同樣的東西，用美國地址還是加拿大地址，會有明顯的差價。不難想像，從事網上交易時，人們很可能因自己的郵編甚至所用設備的檔次而被後台的算法區別對待。運用數字網絡技術的公司往往通過間諜作業將自己置於全知

的地位，極度高效地對時機成熟的行業進行打劫，其結果是將價值的來源越來越多地留在表外，不予回報，最終導致市場的收縮。這種商業模式具有很強的掠奪性、剝削性、寄生性和不可持續性。拉尼爾引用荷馬 (Homer) 史詩《奧德賽》(*Odyssey*) 的典故，把相應的後台服務器稱作塞壬服務器 (Siren Servers)。據《奧德賽》記載，為了聽到塞壬們甜美的歌聲，同時又不因其魅惑而致船毀人亡，奧德修斯 (Odysseus) 並未自恃其定力，而是聽從了瑟茜 (Circe) 的計謀。¹¹ 如果沒有奧德修斯般的足智多謀，還是遠離這些誘人而又危險的服務器為妙。

隨著大數據的到來，信息日益繁盛、廉價，注意力資源日益稀缺、珍貴。與其說人們在消費信息，不如說信息在消費人們有限的注意力。面對不休的信息洪流，人們需要功能強健的篩濾機制，才不致於被淹沒。「信息污染」、「信息繭房」之類的提法不無道理。前者意味著信息之於精神生態相當於碳排放之於環境生態，後者則暗示著「作繭自縛」。赫肖克 (Peter Hershock) 在《佛教與智能技術》(*Buddhism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一書中指出，當人們把注意力輸出給智能設備時，所產生的數據流會轉化為在後台收割注意力的企業的收益及其對人們行為的塑造力。捕獲並保持消費者的注意力是勾起欲望、製造需求的前提。注意力被捕獲意味著時間沒有得到投資，而是被無謂地消耗掉了。注意力經濟由來已久，但目前我們面對的是升級版的注意力經濟。助長它的是對注意力及其所附帶的人類智能之數據痕跡所進行的產業規模的榨取與流通。用戶把稀缺的、可自由交易的注意力交付給平台，換取的是官能、情感和認識上的短暫滿足，猶如跟魔鬼訂立了契約。搜索引擎、社交媒體、購物網站的用戶履行著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雙重職責，在消費實物或信息類商品和服務的同時，他們也在生產用於訓練智能系統的高度「顆粒化」的數據。這些智能系統不知疲倦地、加速地、創造性地、擴張性地捕獲並剝削注意力，從而產生收益。除了來自廣告和網上成交的商品與服務的收益之外，商家還會獲得數據回報。這些數據既可以用於改進產品設計及營銷，也可以當作商業情報來出售。全球性數字連接的基礎設施使產業規模的情報收集成為可能。這正是互聯網接入和服務提供商、社交媒體平台以及購物網站近十至二十年爆炸性成長背後的深層原因 (Hershock, 2021)。平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型企業具有僱員少、自動化程度高、市值大、增長快的特點。舉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在2012年，當照片牆 (Instagram) 以10億美金賣給臉書時，公司只有13名僱員 (Lanier, 2013, p. 2)。

時下風靡的幾種數字技術之間有著密切的協同關係。簡而言之，社交媒體使大數據成為可能，大數據又為機器學習或者說對人工智能的訓練提供了數據基礎，人工智能則能投用戶所好，增強社交媒體的「黏性」，促其產生更多數據。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銜接周密的閉環。滋養社交媒體的是廣大用戶的注意力、心理能量和情感投資。「為伊消得人憔悴」，此語不虛。近些年，大大小小的商家相互模仿，變本加厲，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數字攻勢，目標不外乎大眾日益攤薄的注意力。在實體店，索要顧客的電子郵件地址已成為收銀員的基本職責之一，彷彿不予提供，交易便無法完成一般。在索取客戶的個人信息、跟蹤其注意力的投向上，各種網站更是咄咄逼人。麥肯錫公司 (McKinsey & Company) 若干年前津津樂道的二八定律，即絕大多數人用20%的時間做有用的事情，用80%的時間做沒用的事情，恐怕早已被突破。如今，典型的電子郵箱作為商家必爭之地，更像信息垃圾站，滋擾訊息喧賓奪主，注意力被強暴已成為常態，用戶不勝其擾為時已久。念及微信群，終覺「群眾」有抱團取暖之嫌。如孔子在《論語》裏所言，「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開設多個社交媒體帳戶無非是自討苦吃、以苦為樂。可惱的是，滋擾訊息多是由程序和算法自動產生的，可謂不費吹灰之力。搞得用戶想發作也沒有對象。試問諸君，此時不收視反聽，卻待何時！當然也可以用反滋擾技術和篩濾機制來對付滋擾技術。但不能排除某些技術企業蓄意地「賣矛又賣盾」。總而言之，眾屏奪目會導致精神外泄，令人萎靡不振，如《道德經》所言「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¹² 但養生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經濟角度來說，由於注意力可直接轉換為收割注意力的平台企業的收益，只要大眾不持守心齋，收益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向平台企業，注意力的支出者卻得不到絲毫的報酬，財富急劇集中可想而知。Fischer (2017) 指出，2017年，全世界所有新增網上廣告收益中的83%由谷歌和臉書獲得，15%由阿里巴巴、百度和騰訊獲得。所有其他網上廣告平台僅獲得2%。「勝者通吃」一說絕非誇張。套用菲茨傑拉德 (Scott Fitzgerald) 諷刺「馬太效應」

的話來說，富者越富，貧者則獲得——刷屏時間。¹³ 這便是注意力經濟的法則，稱其為吸血鬼主義(vampirism)毫不為過。《道德經》有云「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注意力經濟可謂逆天之道而循人之道，眼下有烈火烹油之勢的網紅經濟不過是注意力經濟的一種表現形式。值得警醒的是，大眾的逐夢行為對財富的集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除非逐夢者從流行的生活腳本和數字媒介的麻醉中解脫出來，否則所逐的夢到頭來恐怕都無異於煙槍夢。看來德勒茲時常談起的逃逸線問題已成為迫切的社會問題。

平台資本主義：以臉書為例

斯賴切克(Nick Srnicek)在《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一書中談到，在21世紀，先進的資本主義轉而倚重對數據的提取和利用。數據成了促使資本主義發生重大轉型的原材料。斯賴切克視平台為新湧現的一種企業。作為數字基礎設施，平台能起到中介的作用，讓不同類型的用戶發生交互。由於平台介於用戶之間，所以很方便記錄用戶的活動，從中提取大量的數據。可以說，平台是提取數據的裝置。平台能產生也依賴於網絡效應，自然而然地傾向於壟斷，而且增長的限制很少。為了產生網絡效應，平台不得不採取粗放經營，以付費業務補助免費業務，或者以盈利業務補助不盈利業務。平台貌似虛位以待用戶，實則以其核心架構掌控著用戶間交互的遊戲規則、塑造著市場的面貌。資本通過擁有平台來實現對用戶的控制。他介紹了五種類型的平台，第一類是廣告平台，如谷歌、臉書等廣告平台，他們提取關於用戶的信息，利用分析信息產生的產品來出售廣告空間。第二類是雲平台，如亞馬遜雲科技、Salesforce，它們擁有並出租依賴於數字技術的企業所需的軟硬件。第三類是產業平台，如通用電氣、西門子，它們構建必需的硬件和軟件，從而把傳統的製造轉變為通過互聯網相聯的過程，以降低生產成本，並把商品轉變為服務。第四類是產品平台，如勞斯萊斯、Spotify，它們利用其他平台把傳統的商品轉變為服務，並收取租金或訂購費。第五類是精益平台，如優步、愛彼迎，它們把資產擁有量壓至最低，通過盡量降低成本來實現利潤(Srnicek,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2017, pp. 39–50)。囿於篇幅，下文將以臉書這一廣告平台為例來演示控制型社會新湧現的經濟範式，以及平台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

臉書平台能讓個人和組織佩戴著面具以數字化身的方式在賽博空間交往、交流、交互。用戶或刻意、或隨意的言談舉止，平台都盡收眼底。從用戶在帖子內稀鬆平常的一言一語、表情包中的一笑一顰中，平台能截獲廣告商格外關心的情報，並據此給用戶建立綜合、細密的數字檔案。這就好比社交場所裝了竊聽器和攝像頭，但從事竊聽和監視的是永不懈怠、比魔鬼還要魔鬼的算法和機器人。然而相當比例的用戶卻不以為意，心甘情願地披露有關自己的各種信息。隱私的概念早已被沖淡，就像朋友的概念被稀釋一樣。臉書所謂的「隱私政策」充其量是一種諱飾。稱之為「監視政策」似乎更切合實際。臉書的終端遍及全球，堪稱數字式巨型機器。¹⁴ 其用戶多如螻蛄，夜以繼日地為其撿拾散碎的信息、彙集大事小情。對用戶而言，該巨型機器只生產平台本身和虛擬社交網絡。社交網絡人氣越旺，平台就越景氣。用戶越活躍，情報就越容易搜羅，怕就怕門可羅雀。臉書並不創造任何內容，內容由平台的用戶創造。產生的內容不管是激進還是保守，對臉書而言根本毫無二致 (radical indifference)。臉書更關心內容的吸睛力和繁衍能力。用戶在免費使用臉書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自己所創造的內容的所有權、支配權和求償權。巨量的用戶以無償的勞動維繫著臉書內容的翻新和周流不息。可以說，用戶更像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真正的消費者是廣告商。臉書平台背後的算法和機器人扮演著跟蹤、導流和數據採集的角色。用戶的象徵性行動 (symbolic action) 與互動、習慣與嗜好都是數據採集的對象。所採集的數據跟所吸引的注意力都是臉書獲取廣告收益的資本。分析數據所產生的「產品」無非是對用戶行為相當確定的預測。例如，臉書提供的「忠誠度預測」服務能通過分析作為「數字麵包屑」和「數字尾氣」的行為盈餘 (behavioral surplus) 來預測有貳心的風險個體。這些預測會觸動廣告商即刻以志在必得的訊息進行定向干預，從而預阻脫落，穩定風險個體的忠誠度 (Zuboff, 2019, p. 279)。臉書和用戶之間是一種「寄生的共生關係」(Zuboff, 2019, p. 451)。年復一年，絕大多數用戶非但忠貞不渝，而且攜朋入網。2022年12月，臉書聲稱其每月的活躍用戶已近30億但距離「世無

棄人」的理想仍有差距，其市值亦已超過許多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說它富可敵國，毫不誇張，傳統的製造業望塵莫及。Castells (1996) 指出，成為網絡成員的價值取決於網絡中結點的數量以及通過網絡發生的信息交換的質量。隨著網絡的擴張，人們加入網絡的動力會相應增強。

能夠成為虛擬社交網絡的一員、創作並經營自己的虛擬存在、心血來潮時得以暢所欲言並不時得到鮮花和掌聲、無聊時能夠在精彩紛呈的虛擬空間縱情流連、落寞時總能找到一位新朋舊友半句半句地聊，凡此種種都是臉書的吸引力所在。俗話說，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臉書會不斷地向用戶推薦新朋友，朋友越多，越難割捨。社交網絡的便捷，即其「回報」，離群索居的不便，即其「懲罰」，其「黏性」則體現在用戶欲罷不能，甘願成為算法跟蹤和廣告滋擾的對象。¹⁵ 以「喜歡」等按鈕的形式引入的社會反饋機制使臉書具有了成癮性。2017年，臉書的首任總裁帕克 (Sean Parker) 坦言，臉書的設計目的是盡最大可能消耗用戶的時間和注意力。其想法是不時給用戶發送一劑又稱「可變強化」的多巴胺，所採取的形式是「喜歡」和留言，從而鼓勵用戶上傳更多內容，目標是把用戶黏在「蜂巢」上。用戶在追逐一劑又一劑的多巴胺時，後面會留下一連串原材料 (Zuboff, 2019, p. 451)。帕克認為臉書借助社會認可反饋環的伎倆，利用了人心理上的一個脆弱之處 (Solon, 2017)。說起蜂巢，不能避而不談蜂巢心。俗話說「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如果說「百犬吠聲」形象地描繪了蜂巢心的特點的話，應該不難斷定蜂巢心很容易為策略性地發佈的消息所操縱，不管消息是真是假、是虛是實。臉書何以能夠成規模地影響、干預、改變、塑造、控制用戶的念頭、態度、欲望和行為也便不難理解。這種影響力是一種可以套現的權力。

臉書依照關聯性 (correlation) 原則投用戶所好，在用戶周圍形成一個閉合的反饋環或強化機制，從而把用戶牢牢地囚禁在自己的欲求和偏好所形成的氣泡中。如《道德經》所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如果說《道德經》闡述的是陰柔之道，那麼控制型社會可以說將此道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個想法值得深挖下去。「喜好甚麼就看到甚麼」並非好事，它已成為芸芸眾生的牢籠。換言之，用戶宛如佞臣常在側的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斗，既聽不到拂逆自己的意見，也看不到真實情況。美國新概念藝術家侯哲爾 (Jenny Holzer) 有句口號「保護我遠離我想要的」。該口號適用於成癮性物質，也適用於臉書上出現的迎合性信息，更適用於臉書本身。「遠離臉書，珍愛生命！」(Avoid Facebook. Cherish life!) 這句口號如果在臉書上風行起來，那將是個不小的諷刺。

事實上，每個用戶的臉書所呈現的內容都很個性化，可以說是用戶心的投射、欲念的展示和放大。用戶所看到的內容基本上是自己招惹來的。問題在於，用戶有事沒事都會下意識地到臉書上瀏覽。有時剛離開臉書，隨後開啟的頁面卻仍是臉書，彷彿著了魔。「強迫」(compulsion) 一詞別無所指，製造強迫正是臉書的設計目的。打開臉書就意味著幫臉書聚斂財富。注意力經濟和平台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使然。用戶即便有所警覺，產生了防範意識，也很難跟臉書背後強大的、深諳用戶心理弱點的設計團隊相抗衡。用戶可謂智力孤危，一旦上了平台就處於被監視、算計、坑陷、俘獲的境地。「無力自拔、贖身無望」聽似誇張，其實是廣大用戶心理狀況的真實寫照。

結語：逃逸線問題

德勒茲探討控制型社會的短文發表距今已有三十多年。隨著數字技術特別是算法、機器人、社交媒體、大數據、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的發展，控制已越演越烈，平台資本主義和注意力經濟在西方社會已躍居經濟生活的主導地位。傳統的文化批評根本無力撼動這一經濟構型。規訓型社會的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已讓位於控制型社會的微觀政治 (micropolitics)、心理政治 (psychopolitics) 和神經政治 (neuropolitics) (Deleuze & Guattari, 1987, pp. 208–231; Foucault, 2008; Han, 2017)。說起心理政治，不應忽視用戶內心深處對平台所懷有的技術厄勒斯 (techno-eros) 之作用。在當今的技術企業裏，用戶體驗 (user experience, UX) 和用戶接口 (user interface, UI) 都是默許的核心職能。這一點足以說明問題。這些職能跟設計都密不可分，而設計又離不開反饋機制及其背後的控制論思維。引入反饋機制的目的不外乎可用戶之心。令人感慨的是，平台企業似乎比典型的批評家更懂得人的心性。總而言

之，傳統的哲學和倫理學已無法對治當今的社會問題和倫理問題。對逃逸線的探尋不只是個人的問題，或左翼精英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的問題。近些年諸多人文學科不約而同地把注意力投向數字人文乃至數字資本主義，這絕非偶然。

談起數字技術不能避而不談《易經》。數字技術跟《易經》有著很深的淵源關係。數字革命之父、二進制數字的發明者萊布尼茨 (Gottfried Leibniz) 發現伏羲卦的排序跟由0到63的二進制數字完全吻合。二進制數字則是數字技術的通用語言。實施控制的所有程序之指令都是在轉碼為二進制數字之後由硬件執行的。不管是控制生命的基因圖譜，控制人心的命令性語詞，控制意志、情感及身姿的音樂，還是控制數字設備的程序，都是由有限的符碼排列組合而成的，而六十四卦所體現的恰是陰陽二爻的排列組合。《易經》與控制的聯繫不只是技術層面的，更是認知和智慧層面的。所謂「當局者迷」，《易經》這本凝結著中華民族獨特智慧的典籍以象示局，以彖斷事。六十四卦作為啟發手段有助於克服當事者的心理盲區，在揭示其處境包括受制之因的同時，也提示著亨通之道。談論控制，《易經》無可迴避。囿於篇幅，此處不便展開。借用《易經》的卦象而言，數字技術如坤（虛受性）、如巽（彌漫性、入侵性）、如離（奪目性）、如坎（危險性、陷入性）、如兌（愉悅性乃至成癮性）。基於數字技術的控制型機器兼有如上所有屬性。探尋針對控制型機器的逃逸線需要非同一般的高明和智慧。弗盧瑟在他的作品中屢屢提到形式性學科在裝置社會亦即控制型社會的重要性，這些學科包括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博弈論、集合論、概率論、統計學、決策理論、量子理論等。言下之意，控制型社會的批評家必須更新自己的思維和語彙，對控制問題要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以傳統的批判思維從事批評猶如抱薪救火，因為這種批評已淪為控制型機器的一個功能，是其反饋機制的一部分，最終會使其更加柔不可敵。控制型機器是二階的，甚至是 n 階的。它們是控制人、物、自身以及其他機器的機器。

上述分析說明逃逸線問題一定是個元問題。這意味著以抗拒為念者必須像弗盧瑟所說的遊戲者一樣，超越控制型機器，從更高階與之博弈。迴避或投靠，即「背今向古」、獨善其身或者以裝置為安身之地，皆非出路所在。弗盧瑟提出的對策或逃逸線之一是對話式編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就目前情況來看，絕大多數人不具備這個素養，甚至無意於逃逸。繼續任由技術企業擺佈，偶爾單槍匹馬地、有限度地維維權，是多數人對控制型機器的態度。如弗盧瑟所言，如果有意識意味著不幸福的話，多數人寧可無意識卻幸福地活著。愛因斯坦稱之為豬欄的理想。現實地講，對逃逸線的追求十有八九是少數派的追求，除非絕大多數人的倫理取向發生少數化轉變。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充其量只是一個召喚結構。其「群眾」需要通過閱讀本文，以及類似的文本來產生。所以本文的社會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修辭衝擊力。

令人好奇的是，弗盧瑟傾向於把伴隨裝置社會而來的職能主義跟儒家思想相聯繫。他筆下的職能員或多或少帶有儒家色彩。曾子所說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完全適用於職能員。但儒家也不乏反職能主義的思想，如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荀子所說的「君子役物」。《中庸》所講的「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既意味著對裝置的適應，也意味著對裝置的超越。總之，秉持積極入世姿態的儒家思想對需要長期面對裝置的大眾而言，必然有心法上的借鑒意義，但也很容易讓大眾成為不折不扣的職能員。以逃逸線、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生成(becoming)、游牧主義為念的德勒茲在倫理取向上更接近於追求逍遙、無為、解脫、自在的道禪思想。但他對游牧的理解很微妙，接近於禪宗的「轉心」而不是「轉境」，以及莊子所說的「陸沉」。道禪著作裏不乏應對控制型機器和注意力經濟的思想武器，如莊子的「心齋」、「物物而不物於物」，陸機的「收視反聽」，《圓覺經》的「無縛無脫」，百丈懷海的「即此用，離此用」，臨濟義玄的「隨處作主」等等。另一方面，如今的大眾鮮有樂意遵守清規戒律者。言下之意，為了抗拒控制而甘受規訓何嘗不是一種悖謬。

在數字媒介的業風狂吹不止的歲月，似乎人人都需要一粒定心丸。世情如此，難免會有人把它想像為又一個應用程序。然而自性本定，何須外求甚麼定心丸。當廣大信息勞工在信息的洪流中不得消停、突然羨慕起上山雖艱難、下山卻安閒的西西弗斯(Sisyphus)時，莊禪之學作為生命哲學的積極意義方能充分顯現(Camus, 1955, pp. 88-91)。莊子的心齋如果只理解為拔掉插頭、置身於信息的洪流之外，其時義就很有限。在紛繁蕪雜、千頭萬緒中不失清淨、不起煩惱、不生

掛礙、反得滋養，方謂心齋。如《六祖壇經》所言，「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心齋是一種原地逃逸，也是一門精神養生學。它意味著對精神營養和精神垃圾的鑒別以及以最低消耗對後者進行濾除。在注意力經濟和平台資本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大眾的篩濾成本勢必會飆升。如何打理自身的「篩子」，包括妙用無窮的真心以及應對裝置滋擾的反裝置，已成為緊迫的倫理問題和實踐問題。

德勒茲辭世於注意力經濟、平台資本主義乃至監視資本主義尚未勃興的1995年，因而對這些新經濟範式，特別是其技術細節，不可能有細緻的分析和揭示。逃逸線問題既是一個抗爭和獨異化 (singularity) 的問題，也是一個博弈問題。博弈之策需要在抗爭實踐中不斷迭代、更新。每一輪次的博弈對資本主義的捕獲裝置來說都意味著一次提醒，其程序很可能因之變得更為細密。德勒茲不可能為後來人提供所有的應對之策。雖然如此，德勒茲與瓜塔里創造的諸多概念並未因上述新經濟範式的湧現而失去效用。欲望、情動、去編碼之流、強度、游牧、原地旅行、命令性語詞、面容性、塊莖、篩子、虛在、吸血鬼主義等概念更像是為我們這個時代預備的。德勒茲的作品非惟嚴謹、通透，還揮灑自如，充滿著生命衝動與熱情，其句法本身就演示著對控制的逃逸，傳遞著一種倫理姿態。在眾屏奪目使人心疲神勞的時代，德勒茲的作品實為一種難得的精神滋養，也是注意力的一個有益投向。在博弈實踐中對其進行印證、延展、擴充才是更為成熟的態度。

註釋

- 1 這兩個詞都跟「字母」(letter)有詞源關係。相對而言，同樣是書面語，西文更字面，中文則含糊、多義，有更多的解釋空間。
- 2 程序古已有之。《易經》六十四卦的爻辭、諸葛亮的錦囊妙計作為反饋，以及其臨終遺言作為前饋，都可視為程序。耐人尋味的是，弗盧瑟稱基辛格為「模範程序員」。程序之上又有元程序 (meta-program)。傳統西方本體論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的元程序，而問性論則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和未來文明的元程序。
- 3 職能員是後工業社會或裝置社會最為典型的主體。卡夫卡和弗盧瑟對其均有入木三分的刻劃。簡而言之，在後工業時代，裝置成為社會的中心，人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降格為職能員，荒誕地、隨機地實現著裝置的程序中所固有的虛擬性。職能員思不出其位，視域固於裝置，以符號為現實。忠於裝置、庸庸碌碌是其生存法則。李一君在《後歷史》（*Post-History*）中譯本中將「functionary」譯為「功能執行者」。

- 4 簡而言之，區塊鏈是個信息去中心化的機制。
- 5 根據《佛光大辭典（增訂版）》（佛光文化出版社，2014年），因陀羅網「為帝釋天之寶網，乃莊嚴帝釋天宮殿之網。網之一一結皆附寶珠，其數無量，一一寶珠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又一一影中亦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如是寶珠無限交錯反映，重重影現，互顯互隱，重重無盡。《華嚴經》以因陀羅網譬喻諸法之一與多相即相入、重重無盡之義。」
- 6 裝置是內置有程序的機器，亦即控制型機器。程序由指令組成，起控制作用。
- 7 廓落概念來自柏拉圖的《蒂邁歐篇》（*Timaeus*）。德勒茲把廓落理解為篩子、膜。可以說，任何能起篩選作用的東西都堪稱廓落。電磁場是最原初的廓落。
- 8 真正的遊戲者反對並超越了職能主義。
- 9 因果思維推向極致即為決定論，目的思維推向極致即為宿命論（Flusser, 2013, p. 20）。
- 10 控制古已有之，宗教和意識形態均為控制的方式。在控制型社會裏，控制日益技術化、全天候化。
- 11 瑟茜教奧德修斯用融化的蜂蠟堵住同伴們的耳朵以防他們被塞壬們的歌聲所魅惑，並教他讓同伴們把他綁在桅杆上。如果他懇求他們把他放開，他們得把他綁得更緊，這樣他就可以樂享塞壬們的歌聲，同時又避免船毀人亡（Lattimore, 1991, p. 186）。
- 12 王弼注曰：「為腹者，以物養己，為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為目也。」
- 13 原文是：「富者越富，貧者則獲得——孩子。」出自《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第5章。
- 14 巨型機器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概念（Mumford, 1967; Mumford, 1970）。
- 15 芒福德在《機器神話：權力五邊形》（*The Myth of the Machine*）第12章用了類似的字眼：許諾、賄賂、威脅（Mumford, 1970, pp. 321–345）。

披露聲明

本文作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未獲項目研究經費資助。

Funding

This article was not funded by any project grant.

ORCID

張先廣 (Peter ZHANG) <http://orcid.org/0000-0002-5650-8714>

參考文獻

- Camus, A. (1955). *The myth of Sisyphus and other essays*. Vintage Books.
-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 Deleuze, G. (1995). *Negotiations, 1972–1990* (M. Joughin, Tr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leuze, G., & Guattari, F. L.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 Massumi,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ischer, S. (2017, June 27). Tech giants eating the advertising world. *Axios*. <https://www.axios.com/2017/12/15/tech-giants-eating-the-advertising-world-1513303257>.
- Flusser, V. (2011).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N. A. Roth,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lusser, V. (2013). *Post-history* (R. M. Novaes, Trans.; S. Zielinski, Ed.). Univocal.
- Foucault, M.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G. Burchell, Trans.; A. I. Davidson Ed.). Picador.
- Han, B.-C. (2017). *Psychopolitics: Neoliberalism and new technologies of power*. (E. Butler, Trans.). Verso.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 Hershock, P. D. (2021). *Buddhism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ward a more humane future*. Bloomsbury Academic.
- Homer (1991). *The Odyssey of Homer* (R. Lattimore, Trans.). Harper Perennial.
- Lanier, J. (2013). *Who owns the future?* Simon & Schuster.
- McLuhan, M. (199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The MIT Press.
- McLuhan, M., & Fiore, Q. (2001).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Gingko Press.
- McLuhan, M., & Nevitt, B. (1972). *Take today: The executive as dropout*.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 McLuhan, M., & Powers, B. R. (1989). *The global village: Transformations in world life and media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 Mumford, L. (1970).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he pentagon of power*.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 Solon, O. (2017, November 9). Ex-Facebook president Sean Parker: Site made to exploit human ‘vulnerability’.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nov/09/facebook-sean-parker-vulnerability-brain-psychology>.
- 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 Tiqqun. (2020). *The cybernetic hypothesis* (R. Hurley, Trans.). MIT Press.
- Virilio, P. (1999).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An interview by Philippe Petit*. (M. Cavaliere, Trans.). MIT Press.
-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ublicAffairs.

本文引用格式

張先廣 (2026)。〈數字媒介、控制型社會與新經濟範式〉。《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8期，頁269–292。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ang, P. (2026). Digital media, control societies, and the new economic paradigm.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8, 269–292.